在现代和传统之间：
新闻学作家与中国文化论稿

罗昌智摇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舜数据

摇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新文学作家与中国文化论稿 辑罗昌
智著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圆[illegible]
摇[illegible]

摇Ⅰ援在[illegible]摇Ⅱ援罗[illegible]摇Ⅲ摇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摇Ⅳ圆[illegible]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舜数据核字（圆[illegible]第 员[illegible]号

责任编辑：崔佳斌
封面设计：李摇梅

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新文学作家与中国文化论稿
Zai Xiandai He Chuantong Zhijian——Xinwenxuezuojia Yu Zhongguo Wenhua Lungao
罗昌智摇著

出版发行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摇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员号楼
邮摇摇编摇员[illegible]
网摇摇址摇[illegible]
电子邮箱摇[illegible]
印摇摇刷摇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摇摇本摇[illegible]毫米摇员[illegible]
印摇摇张摇[illegible]
字摇摇数摇[illegible]
版摇摇次摇[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员版摇[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员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illegible]
定摇摇价摇[illegible]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摇摇录

绪摇论 辕员
第一章摇胡适 :浸于传统与“再造文明” 辕员员
摇第一节摇“反孔”与“崇儒” :胡适与儒家文化 辕员圆
“打倒一尊的门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摇第二节摇研读《老子》、《庄子》 :胡适思想与国学经典 辕员远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胡适追幕的老子
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与
“达观主义”
摇第三节摇破坏旧典范与创造新形式 :胡适的文学观与传统文化 辕圆猿

第二章摇鲁迅 :作为“中间物”的文化价值重估与时空超越 辕圆愿
摇第一节摇亲近与疏离 :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判性认知 辕圆怨
亲近庄子 :文化思想上的认同与契合——疏离庄
子 :摆脱“古老的鬼魂”以利“峻急”之战斗
摇第二节摇批判与承继 :鲁迅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双重策略 辕源愿
礼教“吃人” :鲁迅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批判——“中
间物”之于“中庸” :鲁迅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合理解
构——打破“铁屋子”与疗治“国民性” :鲁迅对儒家
文化传统的承继
摇第三节摇虚无与死亡 :鲁迅对佛教文化的生命体验 辕缘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通往地狱的通路上”,“成为佛教的圣者”——“于一切有中看见无所有”,“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向死而在”,“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摇第四节摇潜隐的故乡情结:鲁迅对吴越文化的眷恋 摇摇摇
“真的猛士”:用“硬骨头”撑起“倔强的魂灵”——“走异路,逃异地”:到“异端”中“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自为越人,未忘斯义”:“绍兴师爷”对故乡文化的守望

第三章摇周作人:啜一口“苦茶”与文化圣哲相晤一室品人生 摇摇摇
摇第一节摇“苦茶翁”的“苦口甘口”:周作人对佛教文化的体悟 摇摇摇
“苦人这两个字,引起我许多亲密的感情”——“这种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虚空之虚空”,“太阳底下无新事”——“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
摇第二节摇一个“孔子的朋友”:周作人对儒家文化的倾心 摇摇摇
打破“定于一尊”的儒家垄断——恢复“理性”“中庸”的“纯儒”状态
摇第三节摇种“性灵”在“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的文学观与传统文化 摇摇摇
种“性灵”在“自己的园地”—— 融儒、道、佛于一体的文学观

第四章摇许地山:游走于佛道之间的文化“真人” 摇摇摇
摇第一节摇“生死存亡”,“命之行也”:许地山生命观念与庄子人生哲学的契合 摇摇摇
“生死存亡”,“命之行也”—— 安时处顺,“无为无不为”——“守柔曰强”,“乃合天德”
摇第二节摇走向尘世的两极:许地山与佛教文化的不解情缘 摇摇摇
“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生本不乐”:攀援着“苦”与“空”走向尘世的一极——“红尘有爱”:摩挲着“情”与“俗”走向尘世的另一极
摇第三节摇禅道佛理与艺术的缠绵:许地山小说的审美旨趣 摇摇摇
传奇浪漫的“人的文学佳果”—— 睿智空灵的审美旨趣

第五章摇郭沫若：传统的智性接受与文化的诗性创造 [illegible]
摇第一节摇从“道我一体”到“我即是神”：郭沫若与庄子思想 [illegible]
知道了“‘道’是甚么，‘化’是甚么了”——悖离“厌世的思想家”
摇第二节摇“我委实自比过屈原”：郭沫若对屈原的追慕及其对儒家精神的体认 [illegible]
“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屈原是永远值得崇拜的一位伟大诗人”——“我国的屈原，深信有一，不望有二。”
摇第三节摇文化的诗性创造：郭沫若创作个性与传统文化 [illegible]
冲动敏锐：“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叛逆峻急：“我是一条天狗呀！”——焦灼从众：“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女神》：传统文化诗性创造的经典
摇第四节摇植根于“海棠香园”：郭沫若文化心理与巴蜀传统 [illegible]
降生在“海棠香园”的文化宁馨儿——巴山蜀水滋养的文化心理

第六章摇林语堂：“半在尘世半为仙”与“一捆矛盾” [illegible]
摇第一节摇“中国的人文主义”：林语堂解读儒家文化 [illegible]
仁义礼智建构“理性的社会秩序”——“我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
摇第二节摇“偏好自然与直觉”：林语堂崇尚的道家文化 [illegible]
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
摇第三节摇“出世”与“入世”：林语堂的“一捆矛盾” [illegible]
“出世”与“入世”绾结的“一捆矛盾”——用智慧解开人生的“一捆矛盾”

第七章摇闻一多：“红烛”诗人的文化情怀与诗艺追求 [illegible]
摇第一节摇“一首绝妙的诗”：闻一多的《庄子》研究 [illegible]
人格独立：对庄子人生观的认同——“妙得于诗”：

对《庄子》文学性的赞赏——“以丑为美”:对《庄子》艺术观的接受
摇第二节摇“与楚辞结不解缘矣”:闻一多的《楚辞》研究 辛德勇
“诠释词义”:“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无证不信”:“欲读书必先精校书”
摇第三节摇“他自己的时代之子”:闻一多眼中的屈原 辛德勇
屈原之死:“泄忿”、“洁身”是为可信——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摇第四节摇祖国、人民、生命:闻一多诗歌的文化价值体系 辛德勇
“诗人主要的天赋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人民的愤怒”——我“是个生命之肯定者”
摇第五节摇“跳跟博跃”:闻一多的诗艺追求与荆楚文化 辛德勇
“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以开放的胸襟构建诗美大厦

第八章摇废名:点一盏心灵的“灯”照亮思想的美人 辛德勇
摇第一节摇“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废名的文化心理结构 辛德勇
“大丈夫真是应该留荒谬百世的”——在庄禅中实现“安静闲恬,虚融淡泊”的生命境界
摇第二节摇“深夜一支灯”:废名文学创作的哲学意境 辛德勇
“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深夜一支灯 辛思想是一个美人”

第九章摇沈从文:一个浪漫派在 世纪的生命记忆 辛德勇
摇第一节摇“乡间戏剧”:沈从文小说的文化选择 辛德勇
“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一个浪漫派在 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不管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
摇第二节摇“对生命极关心”:沈从文小说的人性张力 辛德勇
“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情结——“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民族身体里去”
摇第三节摇和谐的“边城”: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理想 辛德勇

“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小说的写作，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

第十章 摇 丰子恺：在童心和佛心的笑靥里与生命牵手 [illegible]
摇第一节 摇 梦中的真与真中的梦：丰子恺童心论的生命意义 [illegible]
“童心”：“赤子之心者也”——演绎“童心”：寻找生命的意义
摇第二节 摇 佛光里的生命烛照：丰子恺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illegible]
天生一个佛家弟子——静观人生写真趣——“慈悲喜舍”养“佛心”

第十一章 摇 徐志摩、戴望舒：从“康桥”到“雨巷”的心灵摆渡 [illegible]
摇第一节 摇“性灵中跳出来”的“真纯思想”：徐志摩的康桥理想与诗美形态 [illegible]
“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充满博爱性灵”的“理想的艺术”
摇第二节 摇“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与传统文化 [illegible]
“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在传统的诗艺中“找到新的诗情”

参考文献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绪摇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蕴·粤·宰澡藻说过:“文化遗传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一系列超生物、超肉体的事物和事件,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世代相传。”[①]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以丰富生动的形态和具体的历史性学说通过典籍形式以其思想性与审美性存在于整个中华文明之中,并且形成一种非自觉的“心理积淀”,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文化受体的思想结构。

文化受体在努力珍视传统文化、汲取传统文化滋养并自觉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又往往受到文化传统的拘囿。文化传统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正如庞普所言:文化传统“指的是支配千百万人的习惯和力量,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②]。它总是通过社会心理习惯定势及集体无意识以其伦理要求与行为准则在现实生活中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不敢前进不求创新。为了思想的解放与文化选择的自由,文化受体又必须肩负起反抗文化传统的重任。

圆园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面对如潮奔涌的启蒙主义,第一代觉醒者都扮演着“历史中间物”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自觉充当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评判者和现代文化的催生者与建设者;另一方面,又深感文化

---

① 莱斯利·怀特(蕴·粤·宰澡藻):《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员怨怨苑年版,第 猿怨怨页。

② 转引自王明科:《鲁迅·国民性批判源于传教士》,《甘肃社会科学》圆园园园年第 远期,第 圆园页。

传统“因袭的重担”所带来的压抑与痛苦，出于对“人”的解放的诉求和一种情感上的愤激，他们大都对文化传统采取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在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情感特征诸多方面曾以决绝的反传统态度出现，但那种以隐性形态积淀着的传统文化因子仍然具有较大的生命力，并且这生命力总带来他们同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本身，也尽管有他们努力企图摆脱的消极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传统文人的优秀精神品质，同时又使他们得以在扎根民族意识的新基点上，能以深邃的眼光与坦荡的胸怀去承继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

应该说，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正是此时“历史中间物”群体中的领袖。他们高擎民主、科学的大纛，首倡新文化运动，继而以强力推进“五四”文学革命，并以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化建设的重阵，迈开了后来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化跋涉行进的步履。

当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在检讨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时候，清晰看见 新文学作家们，他们是以怎样的理智辨析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以怎样的热情把能够使他们认同的民族文化的优良成分承传下来，并尽力通过自己的审美创造丰富着传统文化。新文学作家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情感意识的形成以及审美价值取向乃至文体选择等，都与传统文化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常指以儒释道为中心的包括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诸种文化形态。而其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在传统中国文人心灵世界的塑造、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就新文学作家而言，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影响着他们文化思想及其人格精神的形成 在现代文化建构的时空下，新文学作家也同时自主地作出了对传统文化的评判 新文学作家在用灵魂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深层内蕴并融进自己的人格行为中，践行着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精神极大限度地影响着新文学作家的艺术创造。

这种多元性、深层次的影响从新文学一发端就开始了。“五四”文学革命，本质上就承接着晚明启蒙思潮，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本大源上的“谱系学”演进。这一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美学家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在接受与阐释西方美学时就显示出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倾向，这就是他

们都擅长“用老庄一脉思想所模塑的传统‘艺术心性论’来会解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此‘艺术心性论’隐蔽地发挥着融合中西——形成新的美学知识范式的结构性作用。”[①]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对老庄道学、孔孟儒学、魏晋风度、晚明时代的神往，郭沫若、闻一多对泛神论与屈原人格、楚辞浪漫主义艺术美质的创造性张扬，林语堂、丰子恺、许地山、徐志摩浓厚的佛禅意识以及对性灵的倾心，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对乡村的依恋和道风佛性的痴心神迷，都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怀旧情怀”来妄加说明，而极好的阐释只能是传统文化的内在因子现时性地依附在中国文化的肌体里。作为文化受体的新文学作家与传统文化之间脐带式的关系，使他们始终与传统文化是远时空但又是近距离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离开传统，任何文化人欲脱离传统文化就像是抓住自已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只会处于文化“悬空”的尴尬。

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文学作家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衍生性的，也是全程性的。这个过程贯穿在整个 世纪的文学进程中，而且业已延伸到新世纪，永远不会停息。

在现代文化史上，《老子》“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清净无为的政治理想；《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天下为沉浊”的社会认识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理想；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内圣外王”的兼济之志、仁爱礼治的美政理想、中庸处顺的行为准则；佛教人生无常，悲天悯人的忧患情结、“菇苦忍辱，斯乃得度”的精神意志、因缘和合，“以逆为顺”的空无观与自性成佛的“顿悟”以及众生平等的人文关怀；还有“性灵派”因时而变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等等，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新文学作家文化思想及其人格精神的形成。

胡适一生与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在自觉接受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学、政治思想影响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执着与偏爱。在思想上，胡适受老子的影响很大，对老子“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清净无为的政治理想都有多方面的认同。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在文化思想上对庄子就有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并且在关注社会、怀疑和否定现状的态度，批评旧礼教时清醒的理性精神等方面同庄子达到了契合。反对压迫和奴役民众，反对孔孟礼

① 牛宏宝：《以传统“艺术心性论”会解西方美学——以 年以前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一个结构性倾向》，《求是学刊》 年第 期。

教束缚和禁锢人的个性，反对种种名实不符但以营利的虚言陋俗，鲁迅与庄子都有共同的取向。鲁迅与庄子在思想上的这种关联突出地表现在对几千年旧中国制度、文化中虚伪丑恶的一面、凶残吃人的一面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而鲁迅之于儒家文化传统，虽然批判大于继承，但儒家文化中强烈的自省精神、忧患意识、救世情怀等，对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与“民族魂”的鲁迅而言，是永远不能舍弃的文化之本。而佛家经典是鲁迅心灵与精神的伴侣。与致力于启蒙的价值取向一致，鲁迅在主体精神上表现出对于佛教的借重和认同。佛教的苦谛观、虚无观使鲁迅获得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悟解，他以 [illegible]世纪的现代理性精神，赋予了中国文化直面死亡与虚无的勇气。

在 [illegible]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浪漫色彩和传奇色彩的作家应是许地山。他在研究老庄哲学及佛教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以“破网”、“补网”为核心的生命观。网无不破，人生是残缺的，命运是悲剧的；网不知何时破，怎样破，人生命运是不可知的；生当补网，别无选择，一切听其自然，破网自有可爱之处。这便是许地山人生哲学的全部内容。

文化奇才郭沫若，更是有着解读不尽的内涵。单从文化思想和文化品格上讲，郭沫若一生受到中外文化的影响就极其复杂：儒家哲学的濡染，老庄思想的熏陶，王阳明的吸引，斯宾诺沙、加皮尔的感召，巴蜀文化的根性，等等，这使郭沫若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个体。但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里的诗人，郭沫若身上传统文化的因子则是最为密集的。他精通《庄子》，在“天人合一”、“梵我为一”、“道我一体”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我即是神”、“自然即神”为核心的泛神论哲学观。他追慕屈原，对屈原人格及其审美追求中所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有充分的体认。

“文化的进步起源于对现状的批判性思考”[1]。传统不只是被继承的现成物，传统文化总在变化之中而且永远处在重估与创造中被人们生产出来。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现代中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滋养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化根性，新文学作家也在新的文化价值创建中拓展了传统文化的空间。

与“五四”高潮期俯视一切、怀疑一切的激进批判意识相比，[illegible]年代末期到 [illegible]年代，思想界与文学界的视野逐渐转向了新文化的建设和新文

①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 [illegible]年版，第 [illegible]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学的创造。由于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从破除一切文化传统的束缚与控制走向对传统文化的重估。胡适对于儒学作为学术、儒学的文化价值与义理、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合理精神，就是在整理国故的层面上作出的辩证的理性思考。他多次解释，新思潮的意义在于一种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孔教的讨论就是要重估孔教的价值，发现其内在的价值。他指出，对于旧儒学的态度，就积极方面来说，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做整理儒学的工夫，而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这是对儒学内在价值资源的一种挖掘，期冀开出新的文明要素。

鲁迅与传统文化，构成的同样是一种以承继和重估为基础，理性地判断传统文化价值并将其纳入现代时空，建构新的文化的关系。而落实在具体层面上，对老庄哲学，鲁迅是在亲近与疏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批判性的认知；对儒家文化，鲁迅采取的是批判与承继的双重策略。如之“中庸之道”，鲁迅认为“中庸”“至善”是不可能的，人总是有限的、欠缺的，不可能达到至善。他拒绝了“永久”，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凝固”与“不朽”，确认了万事万物的过渡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思想。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是对“中庸”之道的一种解构，从理论上彻底地摒弃了一切关于至善至美、关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神话。

与鲁迅一样，周作人对儒家文化所取的也是一种发展的现时性立场：一方面他坚持个体精神自由的宗旨，反对“定于一尊”，将儒学宗教化、神话化，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垄断；另一方面，他又对“五四”时期于儒学的批判进行了反思，试图用儒学的理性和中庸来反对中国民众专制的迷狂，恢复儒家文化的“纯儒”状态，以复兴儒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郭沫若极度高扬自我主观精神，这是他为庄子所“陶醉”和“支配”的思想呈现。但是，郭沫若和庄子之间有着极大的质的差别。在高度赞扬庄子的齐物思想、“道”的无差别思想、肯定精神的绝对自由性及其为时空所拘囿的现实性的同时，郭沫若将自我意识揉进对庄子“道”的阐释中。他认为道是本体，精神只是道的表相之一，然而作为道的万汇表相之一的精神，却是实现体相如一的关键，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上天入地，化育万物，与道合而为一。当这精神与道合而为一时，它便与道一

①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illegible]页。

样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和无限，有着无所不能的创造伟力。同时，郭沫若赞颂的庄子的“道”，主要是赞颂“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思想，而不是肯定庄子那混沌迷朦、不可捉摸、无从认识的“道”。他从庄子的齐物思想中获取的只是对泛神论的认识，并使之成为自己反抗黑暗社会的利器。郭沫若的泛神思想虽然有着庄子的自我主观精神高于一切的杂质，但他的“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显然突破了庄子把“道”作为万物本体思想的拘囿，真实地体现了他高扬自我主观精神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抗压抑和摧残人性的民主主义思想。郭沫若不仅改造了庄子的“道”的本体论，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打破了庄子“道”的非理性的不可知论。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总能智性地面对传统，承继传统并加以诗性地创造。

闻一多、林语堂、许地山、废名们，属于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众多的学者型文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缘上的依恋感，他们一生都在用身心解读着传统文化经典，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挖掘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并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

把爱祖国的文化看作是一种理智行为的闻一多，“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①]闻一多研究庄子，通过对庄子生存状况的分析阐述《庄子》所体现的思想性，并由此深入，表现出自己对庄子人生观的认同。庄子主张以泰然处之的态度来顺应一切人生与社会的变化，如果人的喜怒哀乐能够超越自然变化之上，那他就解除了外物的束缚，达到一种精神自由。闻一多所认同的，就是庄子这种“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敝屣富贵权势的生命风范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生态度。在潜心研究《庄子》的同时，闻一多对《楚辞》也作着精辟的解读，并且以《楚辞》研究的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方法最纯熟、成绩最突出、影响也最大，特别是微观研究上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在研读《楚辞》的过程中，闻一多产生了对屈原无限景仰的文化心理，并一生景行屈原的精神最终成为一个“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民主运动斗士。用“红烛诗人”炙热的爱国心“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在“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朱自清《挽一多先生》）。

“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是以反传统为前提的，打倒孔家店，彻底荡

① 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第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涤封建思想的残渣余孽，建立新的现代思想观念及其价值体系，成为新的文化风潮。在这股风潮中，成群结团的新文学作家站到了孔子的对立面，儒家文化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林语堂却是个例外。他在廓清孔子、孔教、儒家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孟表现出由衷的崇敬之情，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实用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①]林语堂主要不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关注孔子和儒家思想，而是从伦理、人情、人格、生活等方面探讨儒家思想的独特性和价值，表现出他作为文化智者的人文情怀。

讲具有学者气质，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许地山最值得称道。他信奉佛教，且对道教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一生著有《道教史》、《大藏经索引》、《佛藏子目引得》及许多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著。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②]而正是佛道两教，引导了许地山的人生，将他造就成一位游走于佛道之间的文化“真人”。

精采纷呈、沾濡百代的传统文化在艺术审美品格上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庄子》的想象宏富，汪洋恣肆；《楚辞》的“发愤抒情”，浪漫奇谲；“魏晋文章”的狂狷任诞；公安派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精神极大限度地影响着新文学作家的艺术创造。

鲁迅创作与“魏晋文章”的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是一个显见的文学史事实。但在这一显见的事实背后还有着更深远、更微妙的历史联系，那就是庄子的影响。鲁迅在艺术审美趣味上与庄子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趋同。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有比较详尽的论述。而鲁迅自己的《汉文学史纲要》更可作为在文学风格、文学方法和文学笔调上与庄子多有相似的佐证。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论道：“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今存者有《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的评价侧重于对庄子的艺术观照，突出庄子在先秦诸子中的独特美学成就。

---

①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名著全集》第[illegible]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② 转引自周俟松等：《许地山传略及其作品》，载《新文学史料》[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推见出鲁迅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判断力。从鲁迅对庄子作出的美学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庄子的内在精神联系。《庄子》奇诞葱茏的想象力，恣肆瑰丽的文辞，自由驱谴的文风，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妙澈融合的意境，真可谓“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庄子的文学成就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丰富的灵感源泉。而当我们打开《野草》——这部鲁迅深刻、独创的心灵诗篇，不难发现，《野草》与《庄子》在题材、表现手法、艺术形式上都有着内在的相似性。

同样，以郭沫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承继道家文化内在品格以及《楚辞》艺术精神的过程中，也把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张扬到了极至。郭沫若冲动敏锐的个性、叛逆峻急的品格、焦灼从众的心理，都是一种显在的浪漫主义气质。《女神》这部浪漫主义的经典，充满了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高昂的音调，自由的旋律，浓烈的色彩，雄丽的诗风，为中国新诗建立起一座里程碑。

闻一多的文学创作也明显地受到《庄子》较大的影响，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及创造性。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与《庄子》的大鹏展翅、庄周化蝶以及文风的潇洒空灵、汪洋恣肆一脉相通；他“近于病态”、“以丑为美”的审美旨趣也与《庄子》“荒怪丑恶的趣味”达到了某种一致。同时，闻一多也显然是继承了《楚辞》“发愤抒情”、激情浪漫的特点，诗作中充满了沉宏的歌吟与幻漫的情调。

中国历代文人信佛参禅，大都视其为生活中一种很好的“清娱”方式，常以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以艺术的创造对待生活，注意从人物身上得到启示，从山水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以实现“清静心”和“平静心”的表露，这也是老庄哲学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因而，写作也就是这种精神超脱和人生情趣表露的绝妙方式。如王维诗画、苏轼诗文、李贽“童心说”、三袁“性灵说”，都有佛理禅趣、老庄义理，都与其宗教修养和精神境界有密切关系。废名在崇尚佛禅、体认儒道的过程中，把传统哲理潜移默化，也把传统文化将宗教信仰情感化、人格化、生活化的文化精神承传下来，并且形成了观照、把握世界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

明末公安派提出：文学创作应该“任性而发”，“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观点，就是要求作家重视对个人思想情感作真实无伪的抒发，重视对人情物态作独特的领悟和把握，并不为创作上的条条框框所拘囿，要有“本色语”、“独造语”。在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同时，公安派还表现出一种求“趣”的审美

意识。

新文学家们对“性灵”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过研读和思考，颇有心得，并有不少作家有所师从。胡适对公安派的推崇自不待说；周作人更是认为“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在于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的创作，从文化选择到审美追求都与“性灵”之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林语堂的闲适性灵小品，不管从内容到形式，还是情致风格，也与“公安”、“竟陵”有着不能否认的师承关系；至于“抒写性灵的诗人”徐志摩，其为人之自由洒脱、飘风俊逸，其作诗之至情至性、申舒真心，都极显性灵之美。丰子恺的创作也颇得晚明“性灵派”遗风。他的性灵散文“贵率真，尊性情，重趣味，写世态，文风崇尚自然本色，追求质朴平淡，强调‘信腕直寄’”①，从而在日常生活与大自然中获得精致的生活享受。不过，丰子恺的性灵美又很清楚地让人看到性灵与佛和道的渊源，“定慧双修”、静观人生的“佛”，虚融淡泊、冲和超逸的“道”，让丰子恺得到了常人难得的人生情趣——一种佛、道融合之间的性灵自由与人生真趣。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人与自然、文化之间相互创造和被创造的事实表明，一定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某种地域文化生存状态，以“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孟子也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孟子·尽心上》）地域文化环境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作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②对此，鲁迅有着切身体验：“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③

当我们把新文学作家放在传统和现代的历史场中，放在文化批判与重构之间进行考察的时候，不可忽略的是，地域文化因素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充分。地域文化对人的文化心理熏染是历时性的，它不仅是文学

① 姬学友：《真性清涵万里天：论丰子恺创作的传统文化意蕴》，《文学评论》灵熙愿年第 辽期。
②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第四册），灵熙蔼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
③ 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 缘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灵熙苑年版。

创作的地域文化场，而且又是作家诗化了的精神家园。

作为降生在“海棠香园”的文化宁馨儿，郭沫若文化心理的内层中是灵醒的崇尚自然、耽于幻想、追新求异、自由浪漫的情趣，在文学创作上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浪漫多姿、雄丽奔放的审美特征。这正是巴山蜀水的毓秀钟灵、文化先知的人文遗风，对郭沫若的生命状态、文化心态、创作形态有着润物无声内在影响的印证。而郭开贞将笔名取为“沫若”，本身就浓缩了对故乡山水的依恋，也表现出对故土文化的一份眷念。

鲁迅的创作尽管受时代精神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但在其审美取向中，故乡历史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这样说道：“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了我不可拔除的浙东性……”故乡文化习性养育了鲁迅，并内化到其人格和文化性格之中，隐性传承在他的创作和审美取向上，那便是以卓苦勤劳、坚韧顽强为特征的“硬骨头”精神，以走“异端”、反传统为表现的批判意识和叛逆人格，以对故乡人情风习、民俗文化的感悟和认同为触媒的艺术创造。

沈从文说过，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一个浪漫派在 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①]这种艺术的理想，促使他的小说描绘的大多是湘西那片古朴神秘、浪漫奇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用牧歌式的笔调尽情展现出湘西世外桃源般的生命状态：恬静自然的乡村，原始古朴的民俗，高洁秀逸的民风，安闲自适的民性。与现代工业社会极度膨胀的物质功利性相悖，这种宁静淡泊、自由纯美，田园美、性灵美交融互摄的生命境界，无疑是让都市人沉迷的一出“乡间戏剧”。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 卷，花城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